

学苑散步文集

尚新 刘法公 丰国欣 魏在江 苏章海 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第一辑

上

學苑叢書·文庫



学苑散步文集

尚新 刘法公 丰国欣 魏在江 苏章海 主编

第一辑

上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苑散步文集. 第一辑:上、下 / 尚新等主编. —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3.6
ISBN 978-7-5178-5468-5

I. ①学… II. ①尚… III. ①语言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096261号

学苑散步文集(第一辑)

XUEYUAN SANBU WENJI (DI-YI JI)

尚 新 刘法公 丰国欣 魏在江 苏章海 主编

责任编辑 张莉娅
责任校对 夏湘娣 李远东
封面设计 观止堂_未氓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宏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53.25
字 数 985千
版 次 2023年6月第1版 202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5468-5
定 价 198.00元(全2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和营销与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71-88904970

五律·潘文国先生八十寿诞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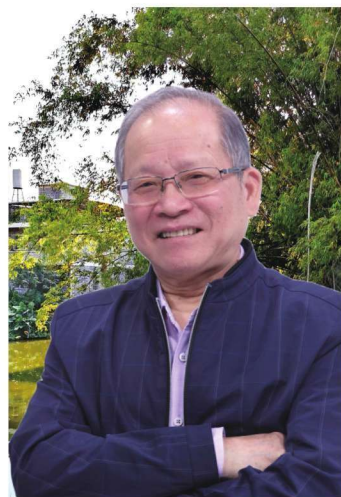
浮生过眼云，
恩义旧陶熏。
反训能为诂，
浅知尝做文。
吾师诚爱我，
心授幸逢君。
四十年前语，
余香尚可闻。

林在勇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2022年7月29日

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名誉会长,国内外著名语言学家,中英双语专家,资深翻译家,第二届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和首届英华学术/翻译奖特等奖获得者。在汉英对比研究、汉语字本位理论、汉语等韵理论、汉语构词法史、中外命名艺术、西方翻译理论、翻译理论与实践、哲学语言学、对外汉语学、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出版



《韵图考》、《汉语的构词法研究》、《汉英语对比纲要》、《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危机下的中文》、《中外命名艺术》、《潘文国学术论文集》、《潘文国汉语论集》、《潘文国语言论集》、“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中文读写教程》、《朱熹的自然哲学》、《赫兹列散文精选》、《中籍英译通论》、《语译哲思:潘文国学术论文自选集》,以及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Philosophical Maxims of 2000 Years Ago*, *Translation and Contrastive Studies*,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Shanghai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plete Works of Zhu Xi and Its Inheritance* 等专著 17 部、译著 9 部、编著 40 余部,发表论文 340 余篇。

序 言

罗选民

潘文国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名誉会长,国内外著名语言学家,中英双语专家,资深翻译家,第二届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二等奖和首届英华学术/翻译奖特等奖获得者。其在汉英对比研究、汉语字本位理论、汉语等韵理论、汉语构词法史、中外命名艺术、中西方翻译史、翻译理论与实践、哲学语言学、国际中文教育、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等领域均具有重要影响。

一、学术视野广阔志愿宏伟,通今博古兼赅中外

文国先生的学术研究以博古通今和兼赅中外为特色,在学界独树一帜。他将语言、文化、哲学、翻译、语言教育融会贯通,了然于心,涉猎范围之广,为当今学界所罕见。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到英语再到汉外对比,从音韵学到语法学到文字学,从语言哲学到对比语言学到翻译学再到翻译实践等领域,都有他辛勤治学的足迹。他在《我的“古今中外”之路》(2013)一文中写道:“从我走上语言研究的第一天起,我就为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后来也作为我的第一个学术主张,这就是,一定要做到‘三个打通’:古今打通、中外打通、语言与文化打通。”文国先生已成功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举其要者:于“古”有《韵图考》(1997a)以及与汪寿明先生合著的《汉语音韵学引论》(1992),于“今”有《汉语的构词法研究》(2004,与叶步青、韩洋合著)在海内外发行,并有《字本位与汉语研究》(2002a)为学界瞩目;于“外”有《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2006,与谭慧敏合著)一书及其英文版在国内外发行;于“中”则有《危机下的中文》(2008a)一部忧世之作。至于交织古今中外的,则体现为对比语言学研究 and 翻译学研究,包括已重印十余次的《汉英语对比纲要》(1997b)、《中外命名艺术》(2007a)、《中籍英译通论》(2021)等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文国先生已出版专著17部、译著9部、编著40余部,发表论文340余篇。

文国先生每发一论,往往都会在学界产生强烈反响,不管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受益于他敏锐的观察眼光和精准的探索深度。学术研究上的硕果累

累,也让潘文国先生广受学界关注和赞誉,2013年他获得中国译协颁发的“中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2017年获得第二届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二等奖,2018年获首届英华学术/翻译奖特等奖。

二、注重吸收本土学术营养,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

面对中国现代语言研究与传统的分离和渐行渐远,文国先生深感忧虑和不安。在《汉语研究:世纪之交的思考》(2000)一文中,他写道:“汉语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站在世纪之交回顾,我们在为一百年来取得的成就骄傲的同时,也为汉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深感焦虑和不安。最大的问题是,迄今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本体语言学,还没有自己的语言理论。”这种“中国问题意识”和“本土情怀”也是从马建忠到赵元任、从王力到吕叔湘等中国近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一脉相承的优秀学术传统。

在语言研究和探索中,文国先生始终注意探索发展中国自身语言研究的“中国路子”,他对传统“文章之学”的发掘,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而语言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转变是他追寻“终极目标”过程中的两大法宝。其对比语言学理论体系正是在文章学的基础上实现完备的。以《汉英语对比纲要》(1997b)为代表的、颇有“语言哲学”色彩的早期论述,虽已初露端倪,但2007年发表的《英汉语篇对比与中国的文章之学》(2007b)以及2012年发表的《寻找自己家里的“竹夫人”——论中西语言学接轨的另一条路径兼谈文章学》表明,文国先生“致力于寻找、发掘自身的学术资源和传统”(潘文国,2012a),并最终把宏观对比研究的理论话语系统引回了“中国传统”。这是他对中国语言学乃至世界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正是基于探索发展中国自身语言研究的“中国路子”,文国先生和徐通锵先生一道,倡导汉语研究的“字本位”学说。作为“字本位”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字本位与汉语研究》(2002a)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部著作中,他指出唯有以字为本位,才能避免古今汉语语法的断裂格局,也只有以字为本位,才可真正实现中西语言的共性研究,矫正中西语言研究的错误对接局面。“字本位”理论在建构过程中,着力解决了语言观、语法观、汉语观、结构本位观、句子观、语篇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徐通锵先生评价道:“文国同志确定了汉字的‘第二语言’的地位,而且还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汉字的性质做出像似性(iconic)定位,并就此展开字义体系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特点的论断。这不仅和汉语的传统研究接上了轨,而且还为与国际接轨开辟了新的途径。”(徐通锵,2002)沈家煊先生在《汉语“大语法”包含韵律》(2017)中断言:“以字为本位确实优于以词为本位。”

文国先生治学的“中国路子”，还体现在建构中国气派的翻译学科理论体系。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是潘先生翻译理论研究的灵魂，他致力于寻找“自家的‘竹夫人’”，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章学”的发现和发掘。他深信，从文章学的角度重新梳理中国传统，并跟外国译论做比较，就有可能构建中国特色译学理论(潘文国,2012a)，专门指导汉译外的实践和研究。他把文章之学的内容归纳为六个方面：句读之学、章句之学(又可分为章句、科判、义疏)、语助之学、文体之学(包括体裁和风格)、文式之学、文法之学(作文之法，比现在所谓“语法”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潘文国,2012a)，从中提取了“义”“体”“气”三个最主要的方面作为统一具体问题的纲领。他从文章学的角度重新阐释了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在他看来，“信达雅”是译者条件，“义体气”既是翻译原则，又是翻译标准(潘文国,2014)。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的“文章学翻译学”理论体系(潘文国,2011,2012a,2012b,2014)，秉承了严复乃至中国古代译学的文章学传统，并对“信达雅”进行理论提升，使之回归到文章学“德学才”的根本要求上，成为指导全局的翻译之“道”；同时又深度结合历代文章学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和自己的翻译实践和研究心得，提出了更具操作性和实用性的“译文三合：义体气”说，用以指导翻译过程和翻译批评，从而完成了“道器并重”的“文章学翻译学”理论体系构建。

多年来，文国先生发表了《严复及其翻译理论》(2004a)等数十篇有关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论文，特别是《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2002b)一文，2021年出版两卷本《中籍英译通论》，在译学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呼吁中国学界结合中国翻译的历史和现状，加强翻译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迎头赶上世界潮流，理直气壮地建立起中国气派的译学理论和译学学科体系，为国际翻译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潘文国,2002c)。

文国先生在翻译领域里耕耘，不仅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气派的翻译理论体系，而且躬身于翻译实践，以检验其所提出的学说价值。*Philosophical Maxims of 2000 Years Ago*(1998)、《赫兹列散文精选》(1999a)、《朱熹的自然哲学》(2003a)等译著以及近几年来从事的典籍翻译工作，更是从实践层面印证了其文章翻译学的理论指导价值。

三、心系中华文化遗产与传播，彰显博大人文情怀

文国先生在治学中真正做到了继承中华优秀学术传统，做学问首先凭借其坚实的“义理、考据、辞章”基础，在学术研究中“尽精微而致广大”。在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的探索中，除了在横向上希望建立与世界普通语言学新的对话机制，让中国语言学以其独特的身姿，进入普通语言学的殿堂，他还致力于在纵向

上续接中国语言研究的悠久传统,以一种理论来纵贯自古至今的汉语研究,让世界三大语言研究传统之一的汉语传统放出现代化的光彩,其《字本位与汉语研究》(2002a)和《中籍英译通论》(2021)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学术思想。

文国先生的治学人文情怀,首先体现在他对语言本质的看法上。“语言的本质在于其人文性,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科学”(潘文国,2005)，“语言学应该是一种人学,语言研究应该体现人文关怀”(潘文国,2006a)。基于这一理念,他指出“语法研究的目的不在贴标签,而在于弄清语言究竟是如何构造以表达思想的”,是保留“汉语的精神”的必由之路,这充分体现了他对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情怀。(潘文国,1997a)

文国先生的人文主义情怀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寻求世界“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博大胸怀。在《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中,他写道:“对比语言学的最终任务就是要在所对比的具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背后的、作为人类语言的共同性,以此来作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友好相处并进行互相交际的基础。我们一再强调对比研究重在求‘异’,我们也一再强调,对比研究的最终追求目标不是‘异’,而是‘同’。我们不能为‘异’而‘异’,找‘异’的目的不是制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人的对立甚至敌对,而是为了在承认‘异’、了解‘异’的基础上实现互补,更好地促进整个人类的共同健康发展。对比研究,乃至整个跨文化语言研究,追求的应该是语言与语言、文化与文化、民族与民族、人民与人民之间的高度和谐和共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追求的与其说是‘同’,不如说是‘和’。”(潘文国,谭慧敏,2006:316)

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心系中华民族的复兴

潘先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主义情怀一样,也始终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和观点表述中。“我总觉得,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质之一,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强烈的责任感。只要他们认为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再大的困难也在所不计。”(潘文国,2008b:序言)正是抱着满腔的社会责任感,在别人还没有看到问题的时候,他一气呵成了脍炙人口、忧时警世的代表作《危机下的中文》(2008a)。该书以“沉重”开篇,文中多次使用“沉重”“担忧”等词汇,表达了潘先生对当时中文使用状态不堪的“忧世”之情,并直面中文生存与发展、语文教学以及汉语研究的危机,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翻译学、语言学以及语言哲学的不同角度,深刻剖析了危机产生的根源,他进而抨击了语文庸俗化、重语轻文、厚今薄古、“科学主义”、“普世”语法观、语法中心以及“跟着转”等一系列中文自卑论调和心态,目的是“理清我们自己的家底,看清

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看清我们面临的危机,找到解决问题、克服危机的办法和措施,让中文在中华民族复兴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潘文国,2008b)为此,他从“匹夫有责”“政府作为”“建设中国特色语言学”以及“继承传统,回归语文”等方面,提出了化解中文危机的一系列关键性对策。

文国先生是构建中国特色语言学理论的振臂高呼者,也是对一百年来语言研究状况的批判者,更是自觉从汉语本体视角出发来研究语言、语法、汉外对比以至于翻译理论的践行者。在《哲学语言学——振兴中国语言学的首要之务》(2006b)一文中,他以乐观的精神道出了对当代和后辈学人的期望:(1)面对传统,我们承担着发掘、继承、弘扬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使命;(2)面对未来,我们承担着继往开来,建设中国语言学的使命;(3)面对世界,我们承担着与世界学者一起,共同建设比现在的普通语言学更具有“普遍性”的普通语言学,为人类语言研究做出较大贡献的历史使命。在《中国语言学的未来在哪里?》(2008b)一文里,他写道:“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经济蒸蒸日上,人民生活不断奔向小康,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已经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前景。在这一形势下,各行各业乃至每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都会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能为这个伟大事业干什么?语言学也不例外,每个语言学工作者都有责任为这一事业添砖加瓦,使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同样,他在《中国学者从事外国语言学研究正道》(2012c)一文里写道:“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的今天,建设、发展中国特色语言学的问题已提上了议事日程。”

文国先生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还体现在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服务工作上。他先后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和会长、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欧美同学会留英分会副会长、英汉语篇分析研究会名誉会长、*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英国)杂志顾问、*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香港大学)外审专家,以及中文核心期刊和外文核心期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评审专家等。特别是作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国家一级学会)的两届会长,以其文化自觉、语言自觉的主体意识引领学会的蓬勃发展,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日益壮大,学术活动达到了空前的高涨局面,为中国的学术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披荆斩棘创始对外汉语教育,呕心沥血育才桃李满天下

1994年,潘先生受命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首任系主任,是我国对外汉语系最早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后任对外汉语学院常务副院长,为语文教育呕心沥血,励精图治,主要贡献体现在专业定位、学科建设、教学理念

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

专业定位上,他在全国最早提出了“双语双文化”的培养目标,现这一目标已成为全国对外汉语专业的共识。他还把对比研究和翻译研究引入对外汉语专业课程设置,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专业特色。从1987年起他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的文章,如《对外汉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与对外汉语专业的建设》(潘文国,1992)、《建设对外汉语专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潘文国,1999b)以及《论“对外汉语”的学科性》(2004b)等。学科建设方面,1997年和1998年,潘先生先后领衔申报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均获得成功,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实现语言、文学“两翼齐飞”创造了条件。2004年他又领衔申报我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博士点(华东师范大学自主设立、教育部备案)并获得成功。

在汉语教学理念上,他特别强调“汉语主体意识”在中文教学中的重要意义。在《对比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兼论对比研究的三个时期、三个目标和三个层面》(2003b)一文中,他特别提到了“汉语主体意识的觉醒”问题。潘先生将语言教学深深扎根于语言研究、语言对比研究,提出“不存在适用于一切语言的语言教学方法,语言教学必须结合所教语言的特点来进行;而语言特点又是深层次语言对比研究的结果”(潘文国,2006c)。他的《字本位与汉语研究》(2002a)也体现了在这个新的方向上的尝试。除了强调从语言特点出发进行汉语教学外,潘先生还注重发掘传统文章学“以读为基础、以写为训练核心”的语文教育方法。他发现,“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主要做两件事:识字、做文章”(潘文国,2007c)。基于此,他创造性地阐发了“读文写白”的语文教学理论,他为翻译专业量身定制了《中文读写教程》,该套教材遵循地地道道的文章学办法,走出了一条语文教育的“中国路子”。

在学生培养上,潘先生1992年起担任现代汉语专业硕士生导师,2000年开始横跨四个学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哲学、翻译学等)担任博士生导师,并在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兼任博士生导师,学生来自中国、韩国、蒙古、越南、加拿大、美国等多个国家,不仅为华东师范大学也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培养做出了积极贡献。源于潘先生的广阔研究领域和视野,他所培养的学生中从事古今中外相关研究的全部都有,领域涵盖哲学语言学、语言理论、汉外语言对比、中西文化对比、翻译理论、典籍翻译等。1992年以来,他先后指导了23名硕士生(含6名外籍学生)、59名博士生(其中10名外籍学生)及4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如今,他的这些门生在不同的工作单位和岗位上都成为中坚和骨干力量,获得国家级社科项目19项、省部级社科项目38项、省部级奖项17项。这充分展现了潘先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的成功卓越。潘先生教育思想的卓越体现在以理念引导学生,并以身

作则地践行,2013年他被评为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生导师。

六、结语

《学苑散步文集(第一辑)》是文国先生的弟子们献给他八秩寿辰的贺礼,我与文国先生相识相知多年,在他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期间一起合作共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受邀为这个集子作序,我感到非常高兴。借此机会向文国先生致以生日的祝贺和衷心的祝福。祝愿文国先生: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参考文献

- 潘文国,1992.对外汉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与对外汉语专业的建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潘文国,1997a.韵图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潘文国,1997b.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潘文国,1998.Philosophical maxims of 2000 years ago[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潘文国,1999a.赫兹列散文精选[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 潘文国,1999b.建设对外汉语专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 潘文国,2000.汉语研究:世纪之交的思考[J].语言研究(1):1-27.
- 潘文国,2002a.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潘文国,2002b.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中国翻译,23(3):30-33.
- 潘文国,2003a.朱熹的自然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潘文国,2003b.对比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兼论对比研究的三个时期、三个目标和三个层面[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1):5-8.
- 潘文国,2004a.严复及其翻译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潘文国,2004b.论“对外汉语”的学科性[J].世界汉语教学(1):11-19.
- 潘文国,2005.谈语法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国外语(1):29-36.
- 潘文国,2006a.语言学是人学[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1):1-4.
- 潘文国,2006b.哲学语言学:振兴中国语言学的首要之务[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11-117.
- 潘文国,2006c.语言对比·语言特点·语言教学[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1-5.

- 潘文国,2007a.中外命名艺术[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 潘文国,2007b.英汉语篇对比与中国的文章之学[J].外语教学(5):1-5.
- 潘文国,2007c.100年来,我们用教外语的方式教母语[N].南方周末,2007-05-24(27).
- 潘文国,2008a.危机下的中文[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 潘文国,2008b.中国语言学的未来在哪里?[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6-102.
- 潘文国,2010.中文读写教程(1—4)[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潘文国,2011.文章学翻译学刍议[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潘文国,2012a.寻找自己家里的“竹夫人”:论中西语言学接轨的另一条路径兼谈文章学[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93-99.
- 潘文国,2012b.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1):1-7.
- 潘文国,2012c.中国学者从事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正道[M].当代外语研究(1):8-10.
- 潘文国,2013.我的“古今中外”之路[J].当代外语研究(2):1-5.
- 潘文国,2014.译文三合义体气: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M].吉林师范大学学报(5):1-7.
- 潘文国,2021.中籍英译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潘文国,谭慧敏,2006.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潘文国,汪寿明,1992.汉语音韵学引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潘文国,叶步青,韩洋,2004.汉语的构词法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沈家焯,2017.汉语“大语法”包含韵律[J].世界汉语教学(1):3-19.
- 徐通锵,2002.《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序[M]//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 言

本卷主要汇集了学界专家围绕潘文国先生的学术思想所做的学术评论、学术领悟和学术畅想,共分为“学思篇”“贺记篇”“感悟篇”“语言探微篇”和“译论探索篇”5个板块的内容。

“学思篇”中鲁国尧先生以“尼采”为题针砭时弊,深入剖析批驳了学界研究一味追求快产、多产、高产,一味追求发表于外刊、名刊的乱象,倡导“进德修业”“轻徭薄赋”和“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贺记篇”选文3篇,宏观概括了潘文国先生的治学成就、治学精神和人文情怀。

王寅先生以《学贯中西的楷模,融汇古今的表率——贺潘文国先生八秩华诞》为题,阐述了潘文国先生在英汉对比研究上倡导从微观到宏观的突破,消解共时与历时的分野,摆脱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并在对比研究中悟出“汉语字本位”的道理,在翻译研究中提出了“文章学翻译学”,在开设对外汉语专业的过程中最早开设对比研究课程,首倡“对外汉语学”的学术追求和取得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成就。

戴汝潜先生以《蓦然回首过耄耋——潘文国先生八十寿辰贺记》为题,记述了其于潘文国先生相识相知的历程,并就《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一著中所贯穿的现代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进行了评价研究,认为构建独具特质的汉语汉字汉文理论体系,必将是几代学者需要付出极高代价的事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这是必须要做好的,而它的起点就是“字本位”,就是以“字本位”为基点的话语体系。

赵文静先生以《知识之泉,源远流长,滋养后学——写在潘文国教授八十寿诞之际》为题记述了她在曼彻斯特大学师从莫娜·贝克(Mona Baker)期间与潘文国先生交往学习的一段经历,从潘先生的中西双修、博古通今、国际学术地位和知名度等方面谈了自己的认知和切身感受,使读者感受到潘文国先生在国外生活和学术活动中的另一面。

“感悟篇”选文11篇,主要围绕潘文国先生的某一学术思想、观点和学术研究方法来阐发其对语言研究的影响和启迪。

沈家煊先生以《“字本位”说的好处一例》为题,阐述了英汉两种语言由于基

本单位不同而造成的节奏单位的参差对应,发现在英语复合词和汉语短语二者之间碰巧形成轻重格式的大致重合。一是因为作为出发点的基本单位不同,二是因为松紧规律对两种语言都起作用,差异在于英语是轻重控制松紧,轻重为本,汉语是松紧导致轻重,松紧为本,而汉语松紧为本的原因是“字本位”,音节(字)等价等重。沈先生指出,这就是汉语节奏以松紧为本对构建节奏理论的普遍价值所在。

何刚强先生以《语言和翻译研究的宝典,“精微”与“广大”学问的楷模——潘文国先生文著纵览后“四悟”》为题,探寻潘先生杰出学术成就背后的几个主要成因及其对中国相关研究界、教育界所带来的影响。第一,潘先生作为文科(包括语言与翻译研究)大学问家,明显是继承了中华优秀学术传统,做学问首先凭借其坚实的“义理、考据、辞章”基础,在学术研究中“致广大而尽精微”,又兼备全局性视野与战略性思维。第二,潘先生的学术成功还与他“采铜于山”的探索精神和努力鼎新研究范式密不可分,“采铜于山”的研究成果是“属于中国学术发展之河的深流”,而以“废铜铸钱”堆成的海量文字只是一时“飞溅的浪花与泡沫”。何先生劝勉后学,厚积薄发,触类旁通,最终有所成就,方为学问正道,并在新文科视野下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三通”人才培养的强烈呼声。

申小龙先生以《普通语言学的索绪尔视角及其当代意义——读潘文国〈索绪尔研究的哲学语言学视角〉》为题,探析了潘文国先生的《索绪尔研究的哲学语言学视角》一文,呼应了潘文国先生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即索绪尔在本质上是语言学中的思想家而不是一般的语言学家,只有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才能看清索绪尔的真正历史定位以及他对后世语言研究的意义,才能看清20世纪“现代语言学”的来龙去脉。而中国语言学者,更应该立足汉语、汉子的文化特征,提出新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来,丰富人类对语言的认知。

黄国文先生以《关于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几个问题——读潘文国先生的〈对比语言学的应用〉有感》,呼应潘先生所提出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是一个学科还是两个学科的问题,指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学科属性问题涉及各种因素,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背景下有不同的认知和认同方式,认为无论是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还是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都有理论构建的任务,无论是理论语言学还是应用语言学,通常都是问题导向的(problem-oriented)。这为我们重新认识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打开了另一扇亮窗。

左鹰先生的《外语习得与母语能力——从潘文国〈母语能力是外语学习的天花板〉一文说起》一文,是在阅读潘文国的《母语能力是外语学习的天花板》一文后引发的共鸣,强调了母语能力既是外语习得的基础,也制约着外语能力的提高,指出我国非理性“外语热”与“母语冷”问题同时存在并互相联系,应引起高度重视,外语教育的时间与范围应注意适度,母语教育的“失位”现象必须予

以纠正。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几年里中国学校教育中语文教育不断得到加强,“母语冷”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牛保义先生的《构式本位刍议——学习潘文国教授“字本位”的感悟》一文,成文于学习潘文国先生“字本位”理论时的感悟,提出了“构式本位”说,阐述了构式作为本位的资格和条件,论述了“构式本位”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使用、形义一体为本位,立足汉语、以社会认知为基础,以及注重形义象征关系等。这一提议丰富了语言探究中的“本位”学说。

鲁国尧先生的《中国音韵学的切韵图与西洋音系学(Phonology)的“最小析异对”(Minimal Pair)》一文对 minimal pair 的汉译过程做了一番细致的考据,提出了将其译为“最小析异对”的適切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深入发掘宋人卢宗迈的精辟言论,指出切韵图及后世的音节表都植根于汉语的特点,千年以前的中国学者已深谙“最小析异对”原理,创造出神奇的切韵图,并呼吁我国语言学界多多挖掘中国语言学的宝藏,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王菊泉先生的《从对应/对等概念的深化看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一文,深入探讨了传统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对应/对等(equivalence)”,指出语言对比研究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对应”,翻译研究中也不存在目标语文本和原语文本在严格意义上的“对等”,更适合作为对比研究和翻译研究共同核心概念的其实是“相似性”。王先生认为,“相似性”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最大限度的对等/对应”则是研究追求的目标,这一特征正在成为对比研究和翻译研究的一种发展大势。

黄忠廉、傅艾的《观翻译与翻译观——读潘文国〈“看山看水”的启迪〉》一文,基于“看山看水”的禅宗故事和潘文国先生的文章,探讨了如何认识翻译的问题,认为译者会历经“见译是译—见译似译—见译只是译”三重境界,这是逐级获得翻译观的认知阶梯,也是人类认识翻译本质的必由之路。这一观点为学界从宏观上认知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支点。

孙艳、张旭的《文章论透外国语,翻译映显中国心——从潘文国译〈〈朱子全书〉及其传承〉看典籍外译的“道”与“器”》一文,从潘文国先生译〈〈朱子全书〉及其传承〉来探讨典籍外译的“道”与“器”的问题,认为潘文国先生在中国传统文章学视野下,针对典籍外译适时提出了文章翻译学指导理念,将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还原为讨论“译事”的宏观语境,并赋予其更为深刻的中国特色阐释,是从中华传统文化脉络对“信达雅”原意的一次系统复位。文章认为,潘先生在典籍外译领域倡导的文章翻译学,其核心可理解为“外国语、中国心”,对译者的要求更是上升到对翻译事业的道德境界,译者只有在深谙中华文化根基、通识中外语言精髓的基础上才能将中华典籍外译工作做大、做好、做强。

“语言探微篇”选文 10 篇,主要围绕当前语言研究以及语言教学研究中的